

# 沉没的历史

从“黑石号”“印坦”“井里汶”沉船谈9-10世纪我国陶瓷的外销

□ 项坤鹏

9-10世纪,中国对外贸易迎来第一个高峰时期,陶瓷大规模外销是这一时期对外贸易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东南亚作为中国陶瓷外销的关键节点,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水文环境,导致该海域存在大量不同朝代的沉船。其中,爪哇海域发现的黑石号沉船(Belitung Shipwreck)、印坦沉船(Intan Shipwreck)和井里汶沉船(Cirebon Shipwreck)备受关注,这三艘沉船打捞出大量中国瓷器及其他物品。对这些沉船出水文物的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当时中国陶瓷外销的具体情况。

黑石号沉船发现于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Belitung Island)附近,因打捞时旁边有黑石礁而得名,部分专家也称之谓勿里洞沉船。该船年代约为9世纪早中期,经造船专家判断,它可能是一艘来自阿拉伯波斯地区尸罗夫港(Siraf)的船只。因客观原因,无法对黑石号沉船遗物进行整体的数据统计。出水文物中,以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入藏最多,共计53227件,其中长沙窑瓷器50589件,广州地方窑瓷器1591件,邢窑瓷器256件,越窑瓷器

218件,白釉绿彩瓷器185件,邢窑瓷器119件,陶器17件,金银器及鎏金银器66件,铅、铜器55件等。

亚洲文明博物馆入藏的黑石号出水器物中,长沙窑瓷器数量最多,加上湖南、上海、香港等地博物馆零星收购的,有学者统计黑石号沉船中长沙窑瓷器总数为57500多件,在黑石号沉船中占绝对多数。此外,沉船周围散落着大量铅锭,出水6吨,这些铅锭可能既作为货物,又起到船的压舱作用。

## (一)长沙窑铭文指示沉没年代

**器型方面:**长沙窑瓷器中碗的数量最多,约占90%,此外还有壶、罐、瓶、熏炉、渣斗、盏、托、杯、碟盒、灯、水盂、动物瓷塑、鱼形研磨器等多种器型。

**年代信息:**一件碗上刻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铭文,宝历二年为826年,是唐敬宗的年号。据此可判断黑石号的沉没年代稍晚于826年,但不会太晚,这也是目前大多数学者认定黑石号沉没于9世纪早中期的主要依据。

**文化内涵:**长沙窑瓷器纹饰和诗文丰富。纹饰有飞鸟纹、摩羯鱼

## (二)其他窑口瓷器重要特点

**越窑:**数量为一两百件,器型精美,有碗、杯、香薰、渣斗等。部分器型可在唐代墓葬中找到对应,如在唐太和四年(830年)郑州张宗武墓和唐长庆四年(824年)三门峡张弘庆墓中能找到相似器型,进一步佐证了黑石号沉船的年代在9世纪上半叶。

**白瓷:**数量不多,可能来自河北邢窑或巩义窑。

**唐青花:**数量不多,为巩义窑产品。

**白釉绿彩器:**白釉绿彩器代表了当时的一种风尚,部分器物与金银器造型有关。黑石号沉船中发现的部分瓷器,如带有“盈”“进奉”字样的白釉绿彩器,表明其与宫廷可能存在联系。这些瓷器进入宫廷及流落民间的渠道存在两种可能:一是被进奉到宫廷后,因赏赐、贸易等原因流落到坊间,最终汇集到广州;二是作为贡赋的剩余品被售卖,而后集散到

广州并登上黑石号。此外,部分瓷器带有龙纹,在唐代,龙常与天子画等号,这显示这些瓷器等级较高。而且,一些瓷器的纹样与前面提到的唐青花纹样相似,均为菱形花叶纹,推测可能存在波斯或阿拉伯定制的情况,反映出异域元素的传入。另外,一些精美的瓷器如高70多厘米带有龙首和小兽造型的执壶,带吸管且内部有小雕塑的杯子等,从器型和装饰来看,有可能是巩义窑的产品。

**广东窑:**有1000多件,以罐子为主,包括不同大小、带系带流等多种样式。部分罐子上有刻字,如一件罐子上的刻字尚未被解读,而荷兰“公主庭院”博物馆一件相似罐子上的刻字被识读为波斯摩尼字母,意为“油”,推测这些罐子可能用于盛油,可能存在波斯人定制的情况。

的产品。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当时陶瓷对外贸易的产品种类比重发生了变化,长沙窑瓷器逐渐在对外贸易中消失,广东窑和越窑的产品比重增加。同时,根据银锭的制作地研究以及乾亨重宝的铸造时间(917年)等线索,可推断沉船年代晚于917年。越窑瓷器的装饰风格等特征也表明其年代应到10世纪。

当时黄巢攻打广州,导致阿拉伯各国失去货源,不敢直接前来中国,他们选择了一个中转点——简罗国。印坦沉船和井里汶沉船船货来源复杂,如果分别航行到原产地收购货物,在主要依靠季风的情况下,对商人来说极为困难,而选择一个中转港进行贸易则方便很多。从船货的叠压关系来看,瓷器等货物的装载方式也暗示了它们可能在中国本土被装载后运到中转港。

关于简罗国的位置,历史地理学者有多种说法,如克龙地峡、马六甲等地,但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简罗国应该在马来半岛的吉打一带。吉打地理位置重要,与巨港号称当时室利佛逝的两个都城,且在古代文献如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有相关记载。此外,在印坦和井里汶沉船上的锡块上有“X”标志,马来半岛的吉打从七八世纪以后就一直有稳定的锡矿开采成果,且在当地发现了很多制作半金字塔状锡块的石质模具,这些锡块与沉船上的锡块有对应关系。同时,在井里汶沉船中也有来自马来半岛的货物。在吉打当地博物馆里,有类似9-10世纪左右的展品,包括半金字塔形状的锡块、具有阿拉伯风格的陶器等,这些都证明当时的吉打是各国商船的汇聚之地。因此,结合考古线索和文献证据,可以推断简罗国很有可能就是吉打,它在10世纪承担了中国瓷器中转的任务。

## 叁 井里汶沉船

井里汶沉船同样是东南亚制造的船舶,沉没年代在10世纪中后期。船货种类丰富,包括金银铜、铁、锡、铅、陶、玻璃等。中国瓷器出水49万件,占比75%,除少量白瓷外绝大部分是越窑青瓷(30万件以上)。从瓷器上的刻划文字“戊辰徐记烧”(968年)以及与其他出土文物的对应关系(如与吴越国康陵、钱元瓘墓、北京韩休墓出土文物的相似性),可确定其沉没年代在10世纪中后期。

## 肆 贸易模式推断

将印坦沉船、井里汶沉船的船货与黑石号相比,前两者面貌相对复杂。这两艘沉船的船货有许多共同之处,如都有金锭,来自马来半岛的锡,来自东南亚和中国的玻璃,东亚的陶瓷、银锭、铅币、陶器等。印坦沉船、井里汶沉船都是东南亚船舶,沉没在爪哇岛北岸相距不远的地方,航线都驶向爪哇岛,船货组合类似。这表明尽管它们年代相差几十年,但可以在同一个贸易模式下进行考察。与黑石号相比,这两艘沉船的船货主要来自西亚、东南亚、中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具有混合性,且陶瓷器产品的品类有显著变化,越窑逐渐成为最重要的瓷器品类。

结合相关文献记载,



黑石号出水八棱金杯



黑石号出水江心镜



长沙窑“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铭文彩绘纹碗



印坦沉船出水南汉国“桂阳监”铅锭

## (三)出水金银器具有较高水准

众所周知,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金银器等级较高,可能与宫廷或官府有关。而我们对比发现,黑石号出水的金银器如金手镯、八棱金杯等,在工艺和风格上与西安何家村窖藏的金银器有明显关联,质量难分伯仲,这表明黑石号出水金银器也具有较高水准。

此外,沉船上还有铅制的阿拉伯地区产品、银锭、铜钱、砚台、玻璃器、筛子等物品。整体来看,出水物品风格纯净,主要为中原风格和阿拉伯风格。船上重达10吨的铅锭是最重

## (四)不同窑场瓷器为何汇集一船?

发沿波斯海岸到东方航行的路线,终点为广州。

(2)在广州载货离岸:唐代广州港十分繁荣,《唐大和尚东征传》《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等文献都有相关记载。《唐大和尚东征传》记载广州港有众多来自婆罗门、波斯、昆仑等地的船只,香药珍宝堆积如山。广州是唐朝唯一设市舶使的地方。《中国印度见闻录》也提到船到中国后政府收30%的税,这表明当时已在广州设市舶使征税。从历史记载来看,当时僧侣出海求法、使者出使等大多选择从广州出发。如《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记载出海求法的人大多从广州登船;义净先从扬州到广州,再在广州等待季风出海;唐朝国使杨良瑶出使黑衣大食时也是从广州经海路抵达巴格达;《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载的“广州通海夷道”明确了从广州出发前往波斯湾的路线。此外,广州是阿拉伯商人的最大规模聚集地,有怀圣寺光塔、清真先贤古墓、蕃坊等遗迹,蕃坊还设有长官管理事务。黑石号船货的组合也可作为其在广州离港的证据,如船中的大罐子、大盘等多为广州产品。广州出土的长沙窑瓷器与黑石号上的瓷器有密切关联,说明长沙窑瓷器有途径运到广州,专家还给出了西线(由广西以水路为主,经灵渠、漓江过番禺)和东线(从长沙窑到郴州等)两条运输路线。同时,黑石号上有大量的铅锭,考虑到广东历来是产铅地,推测铅锭很可能来自广东,装在广东产的大罐子里,这也支持了船在广州载货离岸的观点。

## 结论

9-10世纪时,我国海上对外贸易进入了第一个高峰时期,陶瓷器的大规模外销可视为其标志。位于东南亚水域的“黑石号”、“印坦”和“井里汶”沉船,出水了大量的中国陶瓷器,正是这一历史现象的缩影。9世纪初,“黑石号”沉船从尸罗夫港直航来华,并于广州载货离岸。9世纪末及至10世纪,正如“印坦”沉船和“井里汶”沉船所体现的,在东南亚地区出现了中国陶瓷外销的中转港,地点之一“简罗国”,而触发此事的导火索可能是黄巢对广州的攻掠。

【作者是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博物院考古部副主任,古陶瓷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故宫)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联合大学研究生导师及学位评议委员。日前,作者在南京金陵博物院作“考古广州·海丝专题”2025年第1讲,本文为其讲座综述,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李强整理。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读北宋史书《隆平集》卷五《宋庠传》。

短短400余字的传记,惜墨如金,多是罗列传主的官历仕履,几乎没有什么具体事迹的记载。不过,却集中讲述了宋庠经历的两件事。由于这两件事的性质类似,所以撰者放在一起,连续加以记述。其事如下:

初,制举人与武举杂试,庠建言,六科侍天下并士,宜设次其酒食礼之,武举人别试。上从其请。

庆历中,仁宗召两府资政殿,亲策以时事。庠独以为两汉对策,本廷若草莱之人,臣等备位大臣,自视遇如贱士,非所以尊朝廷,乃请归中书会议上奏。从之。

这两件事,《宋史·宋庠传》和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都有记载。古代的朝廷史官和私家撰史者不乏史识,面对大量繁杂的事实,他们很善于披沙拣金,别具只眼,提炼出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史料入史。那么,这两件事有什么典型意义呢?

## 壹

我们先看第一件事的来龙去脉。

景祐元年(1034)六月,担任知制诰的宋庠和几名官员受命主持了制科考试。如果把进士考试比作大学考试的话,那么制科考试则犹如研究生考试。《宋会要辑稿·选举》记载:“(景祐元年)六月十六日,以翰林侍读学士李仲容,知制诰宋郊、天章阁待制孙祖德、直集贤院王举正就秘阁考试制科。仲容等上吴育、苏绅、张方平论各六首。”当时,宋庠尚未更名,名叫宋郊。

此次主考,看到的景象对宋庠刺激很深。以致事情已经过去一个月后,他还萦萦于怀,终于向宋仁宗提出了上述建议。《长编》卷一四景祐元年闰六月载:“甲申,诏:‘御试制科举人,自今张幕次于殿内,仍令大官给食。武举人以别日试之。’时知制诰宋郊言:‘贤良茂才等科,上所亲策,乃与武举人杂试,非所以待天下特起之士也。宜如故事,命有司设幄供膳,斥武举人就别馆。’诏从郊请。”《长编》的记载尽管比《隆平集》详细,但对宋庠的建议依然是节略。

幸而在宋庠的《元宪集》卷三一收录了他上奏的这篇《上贤良等科廷试设次札子》。这篇上奏卷子不长。过去的官僚奏疏,尽管都是围绕一个主题,但为了能让君主愉快地接受,往往委婉曲折,溯古道今,引经据典,并且还夹杂许多客套话,力争滴水不漏,八面回环,因此即使是件简单的事,形成了奏疏,也篇幅不菲。除了有欣赏文采的嗜好,我估计过去的皇帝也会跳过许多虚文,择要而阅,没有耐心逐字通篇御览。所以,我们也择要来观察一下这篇奏札。

宋庠先是回顾了制科考试当日让他备受刺激景象:

伏睹贤良方正苏绅等就试之日,并与武举人杂坐殿下,洎搗碎写卷,皆俯伏毡上,自晨至晡,无有饮食。饥虚劳瘁,形于叹嗟。虽仅能成文,可谓薄其礼矣。

接着宋庠如此描述了武举人:

武举人等才术肤浅,流品混淆,桀骜试射,与兵卒无异。

这种描述,清晰地反映了宋代士大夫重文轻武的观念。这是进入宋代后,由朝廷的导向所形成的时代风气。让这些“与兵卒无异”的武举人与高级文人混杂同处进行考试的做法,宋庠上升到有亏国体的高度加以批评:

使天子制策之士并日较能,此又国体之深忧者也。臣窃为朝廷惜之。

对此,宋庠没有引古道今,而是搬出了刚刚过去的祖宗法:

臣不敢上引汉唐以烦省览,仰惟先帝故事,布在耳目,缪钟列位敦不知之?谨按真宗皇帝凡五策贤良,皆躬御便坐。其举人就试并于殿席,张幕为次,垂帘设几,大官赐,酒醪茶菽,无不毕供。圣人之心以为张不次之科,待非常之士,所咨者天人之际,所质者古今之宜。言若可行,高者足以和阴阳,跻仁寿,下者足以明利害,观学术。是则所责于人者若是之重矣,所设之礼又岂轻乎?

宋庠说,先朝曾五次开制科,真宗皇帝不仅亲临,还

为应试举人设桌椅,供饭菜,进茶上酒,悉心招待。因为制科是“不次之科”,参加者也是“非常之士”。在这样对比之后,宋庠严肃地指出,如果朝廷还这样慢待士人,就不会招来出类拔萃之辈。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臣恐有司自今以往待士之礼,因循亡弃,则国家设此举,必无异人。”宋庠接着指出了原因:士有高才,必有高节。节高礼薄,将耻而不就。

读书人有读书人的尊严。你不重视我,我也耻于前来应试。即使有人来应试,也是些“轻躁微幸,先身后义之徒”。

这件事是作为读书人的宋庠,为自己的同类鸣不平,呼吁皇帝和朝廷重视读书人的尊严,礼遇读书人。

## 贰

第二件事,则是宋庠在维护自己以及整个由士大夫精英组成的执政集团的尊严。

急于求治的宋仁宗,常常突然召集大臣,发给纸笔,让他们当场提出施政方案。当年开天章阁让范仲淹、韩琦提出改革方案就是一例。这次又在资政殿重演故伎。《长编》卷一六三庆历八年三月甲寅条对此事有详尽记载:

又诏翰林学士、三司使、知开封府、御史中丞曰:“欲闻朕躬阙失,左右朋邪,中外除斥,州郡暴虐,法令非便民者,及朝廷几事,其悉以陈。”皆给笔札,令即坐上对。而宰相执中固解,上复敦谕,至于三四,乃听两府归而上之。

时枢密使夏竦执中不学少文,故为帝谋以策访大臣,而使条对。竦意欲欲困执中也。执中方力辞未许,参知政事宋庠进曰:“两汉对策,本廷若草莱之士,今备位政府而自比诸生,非所以尊朝观,请至中书会议上对。”许之,谕者以庠为知体。

从这条记载看,这件事发生,尽管表现为宋仁宗的求治心切,但背后则是有夏竦在捣鬼,想让“不学少文”的宰相陈执中当场出丑。可见一件事情结果的形成,多有复杂因素,为诸种合力作用所致。观察事相,不可为表象所惑。

夏竦这样做,出于私心,然有失大体。所以,为执政集团中地位尚低的宋庠所反对。宋庠的反对,就像是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是大臣,别拿我们当小学生。

## 叁

宋庠何以对这两件事这样敏感,反应如此强烈呢?这里面似乎有着深刻的背景因素。

宋朝自太宗朝开始大规模开科取士,真宗朝继续实行这一政策,几十年下来,“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从中央到地方,科举入仕的读书人占据政治领域的大小高地,前所未有的士大夫政治终于形成。这种士大夫政治,既激发了读书人的责任感,也唤醒了读书人的自觉意识。士不可辱,士不可轻,高才与高节相应。极大的政治参与,让士大夫拥有了主人翁的尊严。

东晋时期,“王与马共天下”。到了宋代,又有了类似的表述。文彦博对宋神宗说“与士大夫治天下”,跟“王与马共天下”不同的是,共治者并不是哪个人,而是一个阶层,是士大夫群体。共治天下,权力共享,自然地位不低,因而自尊心亦陡增。宋庠在两件事上的强烈反应,其因正在于此。他要维护的,是一个阶层的尊严。

我观察“士大夫”三个字的字形,每个字上面均出头,但士大夫作为一个阶层的彻底崛起,名副其实的真正出头,正是在宋代。人们大多认为,文彦博的“与士大夫治天下”彰显了一代士大夫的自信与自豪。其实,早在文彦博之前,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才更是张扬着天上下地唯我独尊般的绝对自信。在这句话中,哪里有了君主的大半位置!张载并非发为高论,这几句话依托的,正是士大夫阶层空前崛起、士大夫政治主宰一切的强势背景。

士大夫有着自己的尊严,不容轻视。因此说,作为士大夫精英的宋庠的反应,并不过度,实在是极为正常的反应。

(作者现为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并执教于早稻田大学;国内担任四川大学讲座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浙江大学兼职教授等)

## 壹 黑石号沉船

## 贰 印坦沉船

## 肆 贸易模式推断